

С. С. С. Р.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НКВД по Горьк. обл.

ПРОТОКОЛ ДОПРОСА

К ДЕЛУ № 100.23

1937 г. мес. дня. Я. Олег Евг. Зубов Зубов Евгений
(фамилия) (полное, наимен. органа) допросил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виняемого

1. Фамилия Очкин
2. Имя и отчество Мари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3. 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 1911 г. рождения
4.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с. Хаймар КВМД.
5. Местожительство Автомоб. Служба Охр. Горьковск. г. 9.13.19.
6. Нап. и гражд. (подданство) Светлана, русская ССР.
7. Паспорт 2824111111 Арест
(когда и каким органом выдан, номер, исторг. и вл.)
8. Род занятий Зубовой Бор
(имя)

9. Социаль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з семьи торговца
(род занятий родителей и их социаль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澳] 玛拉·穆斯塔芬 著

李尧 郇忠 译

哈尔滨档案

The Harbin Files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НКВД по Горьк. обл.

ПРОТОКОЛ ДОПРОСА

К ДЕЛУ № 10023

1937 г. мес. дня, Я. Горьк. обл. УНКВД по Горьк. обл.
(фамилия) (полн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отчество)
допросил, а именно: С. С. Р.

1. Фамилия

Онишкин

哈尔滨档案

2. Имя и отчество

Мари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澳] 玛拉·穆斯塔芬

3. 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

1911 г.

李尧 郇忠 译

4.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с. Хайнар КНДР.

5. Место жительства

Волгоград. обл. город Октябрьский ул. 9. 13 кв. 19

6. Нац. и гражд. (подданство)

армянка, гражд. СССР.

7. Паспорт

2895011111 Армен

(номер и каким паспортом владеет, номер, ксерокоп и место хранения)

8. Род занятий

зубной врач на заводе им. Молотова
(место службы или работы и должность)

9. Социаль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з семьи торговца
(при наличии родителей и их имущ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10.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д занятий и имущ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а) до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иждивении родителей

б)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с 1934 года самозанят.

11. Состав семьи

Вну Григо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63 г., мать Мари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56 лет, на иждивении, брат 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45 лет, арестован органами НКВД, брат Яков - 35 лет, арестован, с. 2. Выходит из...
(указать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их имена, фамилию, возраст и род заняти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尔滨档案/(澳)穆斯塔芬著;李尧,郇忠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8.10
书名原文:Secrets and Spies:the Harbin Files
ISBN 978-7-101-06314-1

I. 哈… II. ①穆…②李…③郇… III. 纪实
文学—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238 号

书 名	哈尔滨档案
著 者	〔澳大利亚〕玛拉·穆斯塔芬
译 者	李 尧 郇 忠
责任编辑	余 瑾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frac{3}{8}$ 插页 8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314-1
定 价	28.00 元

历史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能长久地保守自己的秘密。

——约翰·勒·卡雷《秘密朝圣》

如果你唾弃过去，它将在未来重现。

——俄罗斯谚语

人比石头更坚硬。

——切斯娜·阿勃拉莫芙娜·奥尼库尔

本书主要人物

基尔什·莫尔杜鲍维奇·奥尼库尔：我的曾外祖父。1937年10月7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8年1月14日被内务部枪决。1956年10月22日获得平反。

切斯娜·阿勃拉莫芙娜·奥尼库尔：我的曾外祖母。1938年6月14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8年10月20日被内务部判处流放哈萨克斯坦5年。1956年4月28日获得平反。

阿勃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奥尼库尔：我的大舅姥爷。曾任职于苏联内务部。1937年10月17日，大清洗中在哈巴罗夫斯克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9年10月4日被内务部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941年2月11日，因冻饿死于北极圈附近的劳改营，时年33岁。1957年2月获得平反。

玛亚（玛丽亚·格里高利耶芙娜·奥尼库尔）：我的姨姥姥。1937年10月2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8年1月14日被内务部枪决，时年26岁。1956年10月22日，获得平反。

亚沙（雅可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奥尼库尔）：我的舅姥爷。1937年10月2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7年12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1年8月，被提前释放。1956年4月28日获得平反。

加里娅：我的舅姥姥，亚沙的妻子。先仍居住在里加。

基塔：我的外祖母。1999年病逝于澳大利亚。

莫佳·扎列茨基：我的外祖父。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著名的俄裔牲畜商人。

伊娜：我的母亲。20 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居澳大利亚。

阿莱克·穆斯塔芬：我的父亲。鞑靼-俄罗斯混血儿，20 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居澳大利亚。

中文版前言

李

尧发来的邮件“主题”一栏赫然写着：“关于你的《哈尔滨档案》的翻译。”我看了大吃一惊。

这封邮件于2007年6月到达。那时候，我正在墨尔本，搞一个关于“人种学”的课题。对于我，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而不得不苦干两个星期。那天，我还看了一部让人心酸的俄罗斯电影，颇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晚上回到住处，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马上躺下睡觉。可我还是先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和明天的工作有关的邮件。我迅速浏览着，目光被这封署名李尧，显然来自中国的邮件所吸引。我立刻打开。

礼节性的问候过后，“现在我正在翻译你的《哈尔滨档案》”这句话映入我的眼帘。

此话怎讲？他在翻译我的书？谁允许他翻译了？我立刻睡意全无。他甚至说，打算年底翻译

完此书，争取在中国早日出版。这个人是谁呀？他怎么敢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就擅自做主，“翻译出版”我的著作！几年前我在哈尔滨参加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那以后，我收到过好几封邮件，都表示想“迅速”翻译我的著作。我对这种事情很警惕。我认为，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翻得不好，还不如不翻。

不过，这封邮件不同。这个神秘的李尧，不但信写得礼貌而且十分流畅，还提到他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朋友和译者。我认识周思，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信的最后，李尧说希望在澳大利亚见到我，讨论一下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具体细节，包括版权。我意识到，他已经考虑并且充分尊重了我的“知识产权”。但是，什么时候能和他见面还不得而知。

平静下来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邮件，注意到刚才忽略了的一句话：“这本书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两年前推荐给我的。可是我的工作非常忙，一直拖到现在才着手翻译。”

我渐渐想起这段往事。整整两年前，我到北京看望艾伦·托玛斯大使。他是我原来做外交官时的同事。大使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对《哈尔滨档案》的出版表示祝贺之后，再三说，中国读者可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她还告诉我，有个中国教授专门翻译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已经翻译出版了几位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的文学、文化、历史专著。她提到好多作家的名字，不过我只记得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玛斯·肯尼里，还有尼古拉斯·周思。萨利·波斯维克说，过几天大使和她将在大使官邸宴请托玛斯·肯尼里，李尧教授也应邀出席，问我愿不愿意把《哈尔滨档案》转交给他？我立

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哈尔滨档案》就是我的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族的故事。

离开北京之前，我给萨利·波斯维克留下一本《哈尔滨档案》，我甚至在扉页上写下送给这位教授的字样。可是回到悉尼之后，一直忙于工作，就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

我在这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封邮件里得到了李尧何时来访的答案。信正是他提到的尼古拉斯·周思写来的。尼克是作家、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现在也仍然为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努力工作。李尧给他发邮件，问他认不认识我，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正在翻译我的书，更因为，他将在七、八月间访问澳大利亚的4座城市、6所大学，他想在悉尼访问期间见我一面。

我真的激动了！立刻给李尧回信，告诉他，来信收到，知道他在翻译我的书非常高兴。随后的两个月里，李尧鼓励我再补写一章，把《哈尔滨档案》英文版出版后发生的，我一直想告诉读者的事情写出来。他还建议我在中文版里再增加一些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照片。他说中国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离李尧访问澳大利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发邮件邀请他见面后到我家吃饭，告诉他，我的父母都能说流利的中文。李尧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说要给我父亲带一瓶东北烈酒。因为他知道我的父亲来自寒冷的中国东北，一定深深地怀念那个遥远的地方。

和李尧的见面令人难忘。他刚过60，目睹了半个世纪间中国的风云变幻，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型文化人。我们的谈话天马行空，从翻译的

艰难到出版的快乐，从风景秀丽的澳大利亚到我们共同的根——中国。我的丈夫安德鲁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由于获得日本外交官杉原颁发的签证才辗转来到中国上海，逃过法西斯大屠杀。和他们同时逃到上海，幸免遇难的波兰犹太人还有1200名。安德鲁在网上制作了一个节目《芳白路的七分枝圣烛台》^①，讲述的就是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李尧对这个节目极感兴趣。

我的父母到来之后，谈话变成中文。他们给李尧讲了许多当年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父母说中文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研究系读书时学的中文。每逢看到他们说中文，我就特别后悔，自己在有条件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学习。我的父母和李尧有许多共同点。他们3个人都以语言为工具。我的父母是中文和俄文翻译，尤以理工科见长；李尧把英、美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成中文。他也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我的许多亲戚曾经在内蒙古海拉尔生活）。他们都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追忆往事的快乐在我们喜欢去的中餐馆继续着。我们一起吃北京烤鸭、饺子和别的可口的菜肴。吃甜食的时候，李尧和我的父母都想起他们喜欢的中国革命歌曲，不由得轻声哼唱起来。谈起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接下去，我们还合唱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包括《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尧用中文，我和我的父母用俄文。

在李尧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有幸又见到他几次。一次是他在西

①七分枝圣烛台：犹太教堂仪式中使用的有七个分枝的枝形烛台，象征上帝创世纪的七天。

悉尼大学做题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另一次是在墨尔本。那天晚上，我和安德鲁在中国城一家不错的中餐馆为他送行。我们频频举杯，为友谊和理想干杯。

读完这本书的后记，你将看到，自从《哈尔滨档案》出版后，我的书和曾经生活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我和跨越几大洲、几代人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李尧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2008年3月写于悉尼

Contents

目录

1	中文版前言
1	楔子 好奇心
9	里加的“宝藏”
29	泪洒高尔基市
56	满洲大草原
73	骨肉离散
88	从伪满洲国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108	10月的“黑渡鸦”
120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
145	渡鸦去而复返
161	“哈尔滨命令”

171	幸存者
194	哈巴罗夫斯克的亲人
219	远东的奸细
255	平反昭雪
270	重返哈尔滨
299	去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还是去悉尼?
318	亲人的足迹
337	中文版后记
350	致谢
352	译后记

楔子

好奇心

——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我从外祖母的抽屉里偷偷拿走玛亚的照片，那时候我对她还知之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对于我十分重要。我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照片放到一个不太大的中式皮革面相册里。这本相册是我从家里珍藏的哈尔滨的物品中找到的。每一页都有为了镶嵌照片挖空的小框。

玛亚是我外祖母基塔的妹妹。把她的照片镶嵌在紧挨基塔照片的那个长方形小框里，十分得体。基塔的那张照片是1927年，她和外祖父结婚前4个月时送给外祖父的，上面还有她的题字。

16岁的基塔是个古典美人儿。她那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凝视着照片外面的天地，连衣裙领子上镶着白色花边，素净、淡雅——也许是校服——映衬出她的天真烂漫。我非常爱外祖母，但却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对于我，囿于婚姻和家庭，简直无法想象。

玛亚显得与众不同。照片上的她，刚刚二十多岁，看起来精明老练又有现代情趣。她身穿一件开领风衣，黑色的秀发披至肩头，凝眸远眺，好像正在旅途中，具有20世纪30年代那种迷人的美。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玛亚，但我觉得她和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向外祖母要那张照片呢？我明明知道，无论

何时，她都不会拒绝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但直觉告诉我，偷偷拿走这张照片，在外祖母心里引起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此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一起放到那个小相册里的原因。有些照片是在悉尼拍摄的，但多数照片拍自哈尔滨。那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也是我的出生之地。那段时间，我对“俄罗斯人的哈尔滨”——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迷恋渐渐淡漠。我想跨越几大洲、几代人，把一个家族弥合起来的愿望，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确。

俄罗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用已故亲戚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我实际上就与玛亚同名。在俄语里，玛亚的全称是玛丽亚。大伙儿管我叫玛丽亚娜，因为玛丽亚娜和玛丽亚起源于同一个希伯来语词根。到我这儿，就简化为俄语中的玛拉。为什么不叫玛亚呢？在20世纪50年代的哈尔滨，我的家人认为，那个名字太容易让人想起白俄罗斯的那些犹太小村庄。20世纪初，为了躲避贫穷和沙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我的曾外祖父背井离乡，远赴中国。

我长大之后，只知道玛亚曾经是位牙科医生，后来，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哥哥阿勃拉姆一起死于大清洗。那年她才26岁。“她长什么样？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我记得不止一次问过父母这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总是：“她不像你外祖母那样漂亮，但非常聪明。至于她的死，你知道，她死在大清洗中。那时候杀人是需要理由的。”

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迫害，二则为了去苏联开创新生活，玛亚、她的父亲基尔什·奥尼库尔和母亲切斯娜·奥尼库尔、哥哥阿勃拉姆、弟弟亚沙离开了哈尔滨西北的草原小镇海拉尔。那时，基塔已经结婚，就和我的外祖父莫佳·

扎列茨基，还有我母亲伊娜一起留在哈尔滨。

就这样，奥尼库尔一家去了高尔基市。我知道，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放逐的地方。它以前叫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因为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出生在这里，苏联时期就改名为高尔基市。俄语中，“高尔基”是“苦难”的意思，名字起得何等贴切啊！事后想起来，真让人觉得奇怪，奥尼库尔一家在中国东北生活了27年，却偏偏选择在大清洗前夕回到苏联。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俄罗斯人饱受侵扰，尤其像奥尼库尔那样持有苏联身份证的人。

20世纪30年代后期，奥尼库尔一家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之中，接着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我外祖父扎列茨基一家则在日本傀儡政权统治的伪满洲国谋生，许多年，两家一直杳无音信。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大林死后，奥尼库尔家的两个成员——基塔的母亲切斯娜和弟弟亚沙——在大清洗中幸免遇难的消息才传到哈尔滨。50年代末期，切斯娜和亚沙奇迹般地从里加来哈尔滨探亲。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府，他们那时居住在那里。切斯娜带来丈夫基尔什和另外两个孩子玛亚与阿勃拉姆的死讯。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切斯娜和亚沙探亲之后又过了几年，我们全家在1959年离开哈尔滨去了澳大利亚。那时，曾经兴旺发达的哈尔滨俄罗斯人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只有大约一千多人的，时代错误造就的少数民族聚集地。

20世纪60年代在悉尼长大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能逃脱冷战的阴

影。1954年，苏联特工人员彼得罗夫夫妇叛逃之后，澳大利亚人对间谍这种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极感兴趣，几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候，人们常常问我从哪儿来。每逢这时，我就觉得难堪。

“中国。”我回答道。

“不会吧，你看起来不像中国人呀。”

“是呀，我是俄罗斯人。”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是‘白俄’，还是‘红俄’？”绝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澳大利亚小孩儿可用不着回答这样的问题。

“不，我是从中国来的俄罗斯人。我从来没去过苏联。”

“哦，你的父母亲呢？”

“他们也没去过。”

我在星期六去一个俄语学校上学有10年之久。学校很看重苏联人与俄罗斯流亡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为了使孩子们保持民族传统，组织我们学习俄语、文学和历史，还学习唱歌与芭蕾舞。总的来说，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很高，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俄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附加课程创造了条件。不过，学校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们用的教科书虽然都是在苏联印刷的，但是发下来之前，教材都经过校方的审查和删定。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苏联、共产党、少年先锋队（大多数苏联儿童参加的少年组织）以及集体农庄和其他与苏联有关的概念，都用纸贴上了。插图上苏联的标志，比如镰刀斧头的图案，甚至克里姆林宫塔上的红星，也用纸糊了起来。

教我们俄罗斯历史的是位女教师。她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做工